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報

第7卷第2期
2024年12月

Journal of Soc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編印

目 錄

編輯委員會.....	I
------------	---

研究論文

- 宜蘭縣民眾幸福感成因之探究——調節式中介模型分析 01
——蕭瑞民
- 從空間到場所：論中壢車站東南亞族裔的凝聚 49
——張志成、黃文宗
- 參與學習扶助生的自我教育期望與數學學習動機變化
對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 97
——張芳全

研究筆記

- 松山機場遷建：空間發展觀點的利弊分析 135
——歐迪民

稿 約.....	161
----------	-----

Contents

Editorial Board	I
------------------------------	----------

Research Articles

- An Explorati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ell-being of Yilan County Resi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nalysis 01
—— *Hsiao, Jui-Min*
- From space to place: On the cohesion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groups at Zhongli Station..... 49
—— *Chang, Chih-Cheng 、Huang, Wen-Tsung*
-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Remedial Instruction on Mathematics Learning Achievement..... 97
—— *Chang, Fang-Chung*

Research Notes

- Relocation of Songshan Airport: An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Viewpoint..... 135
—— *Ou, Di-Min*

Call for Papers	161
------------------------------	------------

宜蘭縣民眾幸福感成因之探究 ——調節式中介模型分析

蕭瑞民*

*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摘要】

聯合國每年固定發表「全球幸福指數報告」，公布幸福感的世界排名，台灣在亞洲僅次於新加坡。針對台灣各縣市做的幸福感調查中，宜蘭縣每每名列前茅。為何宜蘭居民有這麼高的心理幸福感受？純粹只是「好山好水」環境的影響嗎？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本研究採用 2017 年《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二次基本調查》資料進行量化分析，採用「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檢定宜蘭民眾「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人際信任」、「經濟能力」兩個因素的調節效果。

本研究發現有三，一、網絡規模的確能夠中介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三者之間存在著「部分中介」的效果。二、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網絡規模」之間的關係。三、經濟能力會調節「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亦即，兩者均存在「調節式中介效果」。經由本研究的探討，能夠深入了解宜蘭人心理幸福的影響機制，對於宜蘭在地研究有具體的貢獻。

關鍵字：宜蘭研究、社會網絡、心理幸福、調節式中介效果、健康與福祉

An Explorati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ell-being of Yilan County Resi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nalysis

Hsiao, Jui-Mi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Abstract】

Each year, the United Nations releases 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 ranking global well-being and disclosing happiness levels worldwide. Taiwan consistently ranks high in Asia, trailing only behind Singapore. In happiness surveys conducted across Taiwan's cities and counties, Yilan County frequently emerges as a frontrunner. What accounts for the remarkabl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perienced by Yilan residents? Is it solely attributed to the influence of its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This is a topic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the 2017 'Second Basic Survey of Soci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Yilan Region'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Employ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he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 Network Size -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Yilan residents. Furthermore, it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Economic Capabil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threefold: 1. Network size indeed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displaying a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2. Interpersonal trust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network size. 3. Economic capabil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siz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ignifying the presence of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two.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influencing Yilan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s attained, offer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localized research in Yilan.

Keywords : Yilan research, social network,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緒論

一、研究背景

根據天下雜誌九月份公布的幸福城市大調查，宜蘭以接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幸福回應比例，高居整體幸福感調查第一名。如果幸福感是物質和非物質條件權衡加減，這麼高比例的幸福感，反映宜蘭這片樂土，正堅定朝向全面美好的城市邁進。緊鄰縣政中心、宜蘭運動公園的宜蘭科學園區，是台灣唯一結合生態、生活與科技的園區。園區可租用土地面積三三．八二公頃，在土地開發已飽和的北臺灣，提供另一塊產業建廠的基地。這些優勢，未來也將隨著鐵路高架在園區外設立縣政中心站，引領更多人口來到宜蘭（天下雜誌，2020）。

宜蘭縣的幸福指數三年來一路攀升，從第八名進步到第五名，再從第五名進步到第四名，宜蘭縣不論是在客觀幸福力，或是主觀幸福感，雙雙上升，屬於主客觀雙優的七縣市之一。在進步最多的項目，主觀幸福感方面，是社群關係，較去年進步了 5.7 分，更拿下全台縣市排名第一（蘇秀慧，2019）。

台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 5 日公布「22 縣市有感施政大調查」，宜蘭縣在 16 縣市中，環境保護、觀光旅遊獲得金獎殊榮，在「幸福感」中，外島的澎湖、金門拿下前 2 名，本島 14 縣市宜蘭縣幸福感 89% 最高，花蓮縣居次（李忠一，2021）。

「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是指一種情緒的快樂、滿足，當一個人經歷正向經驗、達到某種成就或渴求時，都會令人感到心理幸福，而生活滿意度被廣泛視為個人心理幸福、心靈健康的重要指標。以上新聞說明在全國各縣市幸福感調查中，宜蘭縣每每名列前茅，整體而言，宜蘭有什麼樣的自然、人文和社會條件，可以在國人幸福感的評比中拔得頭籌？影響宜蘭縣居民心理幸福感的因素為何？

以上提及的較多關注於外在指標，但內在方面，就是社會網絡、人際信任方

面，幸福感會透過哪些內在機制有增強的作用，宜蘭在地顯現出何種特殊性？是值得深究的研究議題。

每年的三月二十日為「國際幸福日」，每當這一天聯合國都會發表「全球幸福指數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WHR）」，公布幸福感的世界排名。WHR 衡量國家幸福感有六大指標，分別是：人均 GDP、社會支持、健康壽命預期、人生抉擇的自由、慈善捐款行為、政府貪腐程度（Helliwell, Layard and Sachs, Neve, Akinin and Wang, 2023）。根據 2022 年的幸福報告，總計 137 個國家中由芬蘭拿下

圖 1

世界幸福地圖



資料來源：<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worlds-happiest-countries-2023/>

表 1

台灣各縣市幸福感排名

排名	六都	總分	排名	非六都	總分
1	桃園市	3.72	1	連江縣	3.96
2	台中市	3.36	2	新竹縣	3.54
3	台南市	3.06	3	新竹市	3.42
4	高雄市	2.74	4	彰化縣	2.48
5	台北市	2.54	4	雲林縣	2.48
6	新北市	2.52	4	嘉義縣	2.48
			7	屏東縣	2.46
			8	嘉義市	2.44
			9	宜蘭縣	2.34
			10	基隆市	2.26
			11	南投縣	2.20
			12	苗栗縣	2.16
			13	台東縣	2.14
			14	金門縣	2.10
			15	花蓮縣	2.04
			16	澎湖縣	1.92

資料來源：2022 天下雜誌幸福城市調查

第一名，丹麥、挪威位居第二和第三名，而台灣則是排名第 27 名，亞洲國家中僅次於 25 名的新加坡，表現十分亮眼。

除了國際性報告，國內也有針對不同都市的幸福感調查，如表 1 所示：天下雜誌《2002 幸福城市大調查》評比指標為環境力、施政力、文教力、社福力等指標，宜蘭縣得分為 2.34，居於非六都 16 個縣市的第九名（天下雜誌，2019）；經濟日報主辦的《2018 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全台二十個縣市中，幸福指數 61.1 分的宜蘭縣排名高居全國第四（經濟日報，2018）。由此可見，以全台灣各縣市比較而言，宜蘭居民的幸福程度屬於前段班。

經由上述國際評比指標觀之，「社經地位」乃基於收入、教育和職業等因素，呈現出社會地位的總體衡量，與幸福感有密切的關連（McLeod and Owens，2004；Wanberg, et al, 2020；黃銘福、黃毅志，2010；張芳全、夏麗鳳，2011）。

表 2
台灣各縣市幸福感排名

縣市	幸福指數	排名			
新竹市	78.6	1	新北市	48.8	11
台東縣	70.0	2	台南市	46.4	12
新竹縣	66.0	3	台中市	46.1	13
宜蘭縣	61.1	4	屏東縣	44.4	14
花蓮縣	60.4	5	彰化縣	37.7	15
台北市	58.9	6	南投縣	36.3	16
嘉義市	55.1	7	高雄市	34.5	17
苗栗縣	54.7	8	基隆市	33.4	18
桃園市	53.9	9	雲林縣	26.0	19
澎湖縣	52.9	10	嘉義縣	24.9	20
			註：粗體字為六都		

資料來源：2018 經濟日報幸福指數大調查

社經地位是工業化之後的產物，回歸到理論本質是 Marx 傳統的「社會階級（social class）」概念。本研究探討宜蘭縣居民社會階級如何影響心理幸福。

再者，從上述幸福感調查選擇的指標看來，社會支持、社群關係、聯繫強度等因素也是形塑心理幸福不可或缺的因素。社會學家提及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指的是人際間的連帶關係，重點不在於個人，而是人與人之間能夠提供的各項支援，例如情緒支持的情感性支援、訊息資源的工具性支援，經由產生連帶對象、聯繫過程的強度，從中產生各種形式的社會功能（傅仰止，2002；熊瑞梅，2001；Burt, 2000；Yen, Fu and Hwang, 2016）。穩定的情緒調節可協助個體形

成足夠的安全感，並進一步促進個人擁有自我信心與能力，探索向外環境中的人事物，以發展出自我價值感以及對自我之「信任關係」（Ainsworth, 1989；Perry, 2001）。人際信任研究中，最廣被使用的定義是「基於對他人意圖或行為的正向預期而產生的一種願意接受自己處於可傷害性的心理狀態」，人際信任有時衍生於正式組織，有時基於自願性的非正式團體，如上司和部屬間，或是同儕的人際往來（Colquitt, Scott and LePine, 2007；Dirks and Ferrin, 2002；陳高等，2011；黃賀、蘇英芳，2005；鄭伯壘，1995）。經研究發現（如 Buehler, Benson and Gerard, 2006；Davies and Cummings, 1994），經由信任關係可進而提升心理幸福感。

關於幸福感的研究很多，但針對宜蘭地區的相關研究則比較少。如林大森（2016）從「依附」觀點出發，探討宜蘭縣高中生家庭、學校、社區對高中生身心憂鬱的影響。發現建立正向親子關係無法消弭青少年的憂鬱傾向，且親子衝突會強化其憂鬱症狀；師生親近與憂鬱有關，但與同儕相處融洽者，更能有效降低身心憂鬱；社區機能與憂鬱有微弱關連，然社區意識對憂鬱的舒緩最為有利。林大森、蕭瑞民（2017）以宜蘭縣居民為研究對象，系統性地研究社會網絡和幸福感的關係，發現：1. 老年民眾之情感型網絡較有鄉鎮差異、中年民眾則是工具型網絡有較大的鄉鎮差異。2. 「空間距離近」的情感網絡對幸福感最為重要、工具網絡則是「親屬距離短」最能夠提升幸福感。3. 居住在宜蘭市的居民，幸福感明顯高於其他 11 個鄉鎮。陳偉瑀（2016）研究結果發現，幸福感為主觀評估目前生活現況滿意、愉快程度，可視為國民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觀光客會選擇具有適當的挑戰性且符合個人技能條件做為參與該項活動的條件。葉明勳、陳碩菲（2019）調查宜蘭地區 65 歲以上長者主觀幸福感、自覺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的狀態，研究發現，參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活動，確實能提升宜蘭縣長者的主觀幸福感。

前述報導點出了宜蘭民眾有著全台民眾數一數二的高幸福感，但哪些因素造就了幸福感受？過去幾乎沒有針對宜蘭的大樣本調查探究此一議題。本論文之分析資料來自於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蕭瑞民教授等人在 2017 年五月完成之

《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 2 次基本調查》研究計畫，將從社會階級、網絡規模、人際信任等度切入，分析影響宜蘭居民心理幸福的機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以 2017 年《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 2 次基本調查》蒐集之資料進行分析，該調查乃以設籍在宜蘭縣 12 個鄉鎮市的居民為母體，成功施測 1,203 居民的大樣本調查研究。本研究的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描述樣本性別、年齡、族群身分、居住鄉鎮等背景變項，以及社會階級、網絡規模、人際信任、心理幸福之基本狀況。
2. 探討在「社會階級」對「心理幸福」影響過程中，「網絡規模」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3. 分析「人際信任」、「經濟能力」在上述因果關聯中的調節關係。併進一步探討是否具有「調節式中介效果」。
4. 呈現研究結果，提供公部門具體的政策與實務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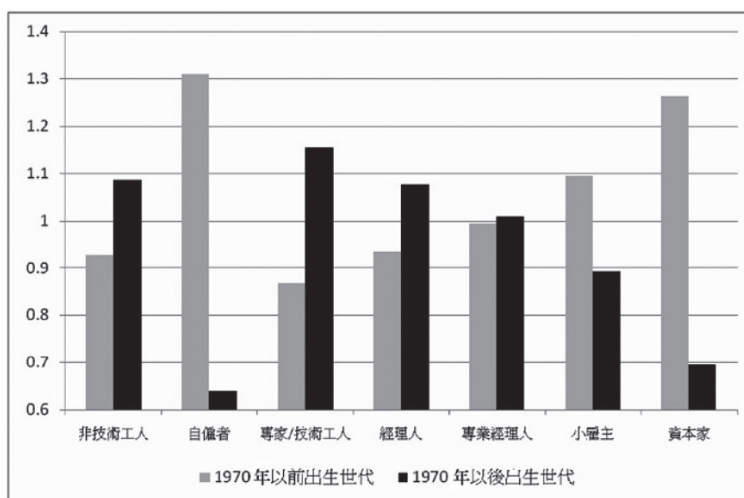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階級的理論與研究

社會階級、中產階級……是大眾都能琅琅上口的辭彙，但階級意涵為何？學理上分為「階級」(class)和「階層」(stratification)，前者是 Marx 傳統，由於對生產工具、經濟資源的掌握程度，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後者則是 Weber 學派，將社會看成從高到低一層一層的結構，分層準則不僅是經濟面向，也涉及了權力(政治地位)、財富和收入(經濟地位)、聲望(社會地位)甚至是生活風格；權力是指個人對他人強加影響的能力，財富和收入指擁有經濟財產，聲望則指獲得良好的評價或社會認可(Weber, 1982)。無論階級還是階層，都是描繪社會不平等(inequality)這個普遍存在的既定事實。

圖 2

台灣階級流動終點發生率的世代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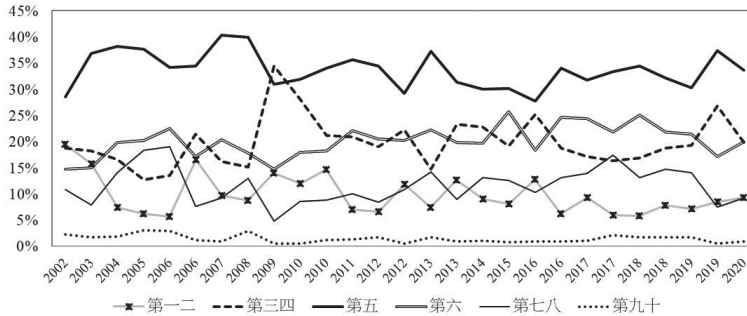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林宗弘（2009），頁 122

不同層級之間存在相互流動的可能性，謂之社會流動，一旦流動就涉及擁有資源變更，向上流動者財富、聲望、權力都會增加，反之亦然。如果流動發生於世代之間，稱為「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即子女的階級位置高於／或低於父母；反之，流動發生於自身世代之內，稱為「代內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如果以鉅視面社會整體作為分析對象，則還有兩種流動的分析：假設社會結構無重大改變，分析總體代內流動和代間流動機會是否不同，稱之為「循環流動」（circulation mobility）；反之，關注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所引發的流動，稱為「結構流動」（structural mobility）（Andersen et al., 2016）。

根據林宗弘（2009）的分析，台灣的各階級在 1970 年代前／後出生者，有如圖 2 的差距，1970 年代之前以「自僱者」比例最高，「專家／技術工人」最低，且從此至「資本家」逐漸升高。可是 1970 年代後呈現逆轉之勢，「專家／技術工

圖 3

台灣民眾主觀的階層位置 (2002-2020)



資料來源：林大森 (2023)，頁 125

人」至「資本家」逐漸降低，逆轉走勢十分明顯，故稱之為「1970 後世代黑手變頭家逐漸消失」（林宗弘，2009）。

以上是以「類別」的概念描述階級，此外亦有「等級」的觀點。中研院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歷年來經常提及一個題目：「我們社會中，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上層，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下層，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最接近這個圖表裡面的哪一層？」由於回答兩極端的比例較少，所以合併處理。圖 3 顯示，台灣民眾認同自己階層於中間（第五層）的比例最高，很穩定都在 35% ~ 40% 之間，其次為第六層和第三 + 四層（約 15% ~ 25%）之間，再往下則是第七 + 八層、第一 + 二層（約 5% ~ 15%），最低比例為最高的第九 + 十層（約 3% 以下）。從以上的統計數字看來，呈現了台灣民眾的認同有三大現象：一是中間居多，兩極端少，頗具常態分配的雛型。二是多年來變遷有限，民眾感知呈現穩定狀況（林大森，2023）。

新韋伯學派學者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對於「職業」的分類相當嚴謹，他們將社會上的職業彙整成高低不同的階級：第一級為專業階級：包含專業人士，經理人，高階技術人員等。第二級為行政階級：辦公室行政及商務人員，業務

員等。第三級為自營階級：小雇主及一般商家等自營工作人員。第四級為農業階級：農，林，漁，牧等從業人員。第五級為技術工：技術人員，現場監督，技術勞工等。第六級為非技術工：體力工，機器操作員，工廠作業員等。此兩人學說的重心在於把 Marx 重視階級的理論傳統，配合後來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換成為「職業」的概念，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證研究上，都相當受到後續研究者的重視。

二、網絡規模的理論與研究

由許多節點以及節點間關係構成的一個網路結構，稱為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節點通常是指個人或組織（又稱社團）。社會網路代表各種社會關係，經由這些社會關係，把從偶然相識的泛泛之交到緊密結合的家人關係的各種人們或組織串連起來，從人與人二者間聯帶接觸至整群人的關連網，因此是一種連接微觀、鉅視層次之理論與分析工具（Walker, Macbride and Vachon, 1977；傅仰止，2002；熊瑞梅，2014）。舉凡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合作，彼此相互溝通即是網絡（Emirbayer and Goodwin, 1994；Lin, 2001；Naisbitt, 1984），社會網路依賴於一種到多種關係而形成，如價值觀、利益、興趣愛好、友誼、血緣關係等，網路結構往往是非常複雜。

社會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用來檢視節點、連結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分析方式，節點是網路中的個人參與者，其間可以有很多種連結。相關討論議題與分析對象有代表人際關係強度的社會整合，以及網絡結構中所蘊含的社會支持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這些重點不在於行動者個人，而是行動者與行動者之間的連帶（Coleman, 1988；Lin, 2001）。社會網絡內涵為社會整合與關係內容（relational content），社會整合指的是關係的強度、頻率；關係的內容指的是關係的品質，如果關係的內容是正面的、能維持情感的，則為社會支持，如果關係的內容是負面的、強制的，則為緊張的關係，相關學術研究已經顯示，社會網路在很多層面運作，從家庭到國家層面都有，並扮演著資源連結的關鍵作用，並決定個人能否成功實現目標（Lin, 2001；Umberson, et al., 1996；Yen, Fu and Hwang, 2016；林

俊瑩、黃毅志，2006）。

社會網絡相關實證研究相當，如 Marsden (1987) 使用年齡、教育、性別、族群、都市化等變項分別與網絡指標進行分析，Wellman (1988) 則是探討不同關係類型與不同聯繫強度的關連，發現同事和鄰居佔據大部分小型往來的網絡，親密網絡大多由親屬和朋友構成，父母子女與兄弟姊妹是最親密的聯繫。Hartup (1996) 認為測量一個個體的友誼，需從三方面著手：是否有朋友、對其朋友的認同、友誼的品質。Santrock (1998) 指出友誼提供了六項重要的功能：夥伴、鼓勵、物質支持、自我支持、社會比較、親密等。友誼關係會影響到與同儕的互動，亦影響到自己心理的幸福感。

國內研究部分，熊瑞梅 (1999) 發現大部分網絡成員是只需短程和本地電話便可聯絡，可見大部分的網絡成員地理親近程度都很強。吳齊殷、李文傑 (2003) 認為友誼應放在不同的層次及脈絡下討論，譬如：有沒有朋友、有沒有相識的人、你認為他（她）是你的友伴，他認不認為你是他（她）的友伴，因為友誼是人與人間相互關係的主要形式。在社會網絡特性、互動結構與友誼動態的關係，謝雨生、吳齊殷、李文傑 (2006) 探討青少年的個人網絡特性和友誼動態之間的關係，發現青少年的友誼網絡是動態的，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網絡會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改變，班級總體友誼動態結構則受到班級總體互動結構的影響。林南、陳志柔、傅仰止 (2010) 詢問受訪者最近跟哪些人「討論重要的事情」，並追問這些人跟受訪者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個人特質（性別、教育、職業），由此測出受訪者自我認知的核心網絡，進而呈現個人社會資源特徵。

傅仰止 (2014) 提及，網絡結構用以分析的測量單位，以網絡規模、網絡密度、聯繫強度三者最為重要，所謂的「網絡規模」(network size) 代表一個人人際環境的大小，就是網絡中的成員數，可視為社會資源 (Marsden, 1987; Tang, Mu and MacLachlan, 2008)，因退出職場、同輩親友逐漸死亡、年老行動不便、社交

需求低，故老年人的網絡規模通常比較小（Kadushin, 2012；Lin, 2001；Hsung et al., 2009；Lin et al, 2014）。「網絡密度」（network density）則代表社會支持以受訪者人際環境的平均關係強度測度之，密度大指網絡成員彼此多有聯繫；密度小則指網絡成員分屬不同社會圈、非重疊且異質性高，有助於行動者資訊多元化（Burt, 2000；Phelps, 2010）。

一個人擁有多少社會網絡與人際關係，往往會影響到從這些人際關係中可以得到的社會支持，進而提高心理幸福，這是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之間的關聯，兩者呈正相關。如社會網絡變項的社會整合和關係品質，對心理幸福的影響大，也就是說社會整合和關係品質愈高，即社會網絡愈佳，心理幸福感愈強。林俊瑩、黃毅志（2006）發現社會網絡對心理幸福有顯著的影響，但社會網絡不見得對心理幸福有正面的促進功能。謝亞恆、謝易庭（2009）的研究分析顯示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有顯著水準，學生在學校所建立社會網絡的高低及人際關係的良好與否確實會反映在心理是否感到幸福或健康。

三、心理幸福的理論與研究

「心理幸福感」乃是個體根據自定的標準，通過對自我生存品質進行綜合性評價，進而產生的一種穩定認知和情感體驗，如 Ryff and Keyes（1995）將心理幸福感量表分成六大構面，包含自我接納、積極關係、生活目標、環境控制、獨立自主、個人成長等一系列維度。Andrews and Withey（1976）曾指出幸福感是個體根據主觀的標準對其生活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向情感上的整體評估，其中包含了生活滿意、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三個成分。Diener 等人（1999）以及 Rosenberg 等人（1995）指出個人主觀對於幸福感的評價包含幸福感（well-being）、快樂（happiness）和生活滿意度三者意義趨近相同，其所包含的層面極為廣泛，從大範圍幸福、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心理健康。

心理學家多以量表 (scale) 嚴謹的程序進行測量，心理幸福感量表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簡稱 PWBS) 認為幸福不僅快樂獲得的心理體驗，更是透過自身潛能努力不懈，而達到完美真實的表現。PWBS 量表與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簡稱 SWB) 並列為目前最常衡量幸福感的量表。國內學者 Chih-Che Lin (林志哲)，建立適用於臺灣地區之中文版「心理幸福感量表 (PWBS)」，作法是將 Diener 等所發展之「心理幸福感量表」翻譯修訂為中文，以大學生及成人為對象，選取 154 人依序完成心理幸福感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正向情感量表、負向情感量表、自尊量表、憂鬱量表之填答，並將所得資料用以檢驗中文版量表之信效度。研究結果支持 8 題的 PWBS 中文版為具有合理適配之單因素結構，因此 PWBS 中文版應可作為適用臺灣地區測量心理幸福感構念的簡短式研究工具 (Lin, 2015)。

實證研究方面，幸福感研究指出經濟發展而後帶來所得水準的提高，未必能帶來幸福感的提升，有錢國家的幸福水準比不比貧窮國家來得高 (Easterlin, 1974, 1995)。許多有關所得水準和幸福感的跨國研究 (Schyns, 1998, Graham and Pettinato, 2000)，發現是幸福感來自於比較，而不是實質擁有以及可以享受的資源量的多寡。根據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 的心理機制 (Kassin et al., 2016)，個人自覺的幸福感受較低，但如果一般人比較的對象是大眾，則自覺幸福感受較高。也就說明了住在窮縣市中較為富裕的社區的民眾，自評幸福感受較強。

國內研究方面，施建彬 (1995) 採需求層次理論的角度，認為個體會努力追求如 Maslow 所言「生理、心理、愛與隸屬、尊重、自我實現」等不同層次的需求；其次就人格特質來看，則是由個體特質和認知方式來解釋幸福感，不同的人格特質 (如外在歸因/內在歸因，外控/內控型人格) 皆會影響看待事物心態，引發不同的處理行為，進而感受不同程度的幸福感。陸洛 (1998) 則指出所謂主觀幸福感是對生活品質的沉思評鑑，它是一種包含了高昂的正向情緒以及對整體生活滿意的主觀感受，認知方面是指個體對生活整體品質的認知評價；情感方面則是指個體在生

活中的情感體驗，包含樂觀、愉快等正向情感，以及焦慮、緊張等負向情感。邱惠娟、童心怡（2010）指出教師幸福感指教師個人主觀對自己的正負向情感、生活滿意與身心健康等方面之整體評估的一種感受與滿意程度。社會長期以來賦予教師許多的使命與責任，因此瞭解教師的主觀幸福感受及其相關內涵便顯得非常重要，倘若教師在自己的職涯中感受快樂與幸福感，則教師會對教學充滿熱情與活力。該研究也提出增進教師幸福感的策略。張芳全（2017）則認為，以社會階層來說，高社經地位的家庭所擁有的財務資本、學習資源、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較多，可以讓子女有幸福感的條件較多；相對地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子女的上述資源與各項資本較少，可提供幸福感條件就相對減少。

四、人際信任的理論與研究

信任議題最早在 1950 年代，開始由心理學者進行有系統的討論，社會學者和經濟學者也從不同角度討論信任這個概念，經濟學者從交易成本理論為出發點，如經濟學者定義信任為「相信是雙方之間的互相信賴，相信在交易過程中，彼此都不會做出傷害對方的行為」。因此信任是一種「正向的預期」，使人在風險狀態中願意相信他人的行為動機對自身是有益且無害的。因此，信任關係在實際經濟行動中是有具體效用的。信任的產生有些是和信任對象的個人特質有關，有些則是和集體和制度有關，不全然附屬於個人特質上。

Coleman（1988）認為信任是對人際間關係的主觀看法，將信任視為對廣泛他人人際來往回報性的一般信任，包含主觀認知和內化的信任規範觀。Putnam（2000）主張健康的市民社會應該高度參與社團，在社團中可產生相互來往的關係網絡進而彼此產生信任。Ikeda（2013）發現東亞社會的家父長式和諧的政治文化價值觀，使得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及一般信任都具有正面效應，相較於西方社會而言。Zucker（1986）則進一步將信任的來源區分為三種，包括：(1) 基於個人背景特質所產生的信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親人、世族，基於血緣或宗教關係而產生的信任感；(2) 基於過去互動經驗所產生的信任，這種信任並沒有血緣連帶的基

礎，而是基於熟悉感，例如曾經有過愉快的互動與交易經驗，而產生的信任感；最後則是 (3) 基於制度（正式社會結構）所產生的信任，這種信任沒有血緣背景與互動經驗基礎，有如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客體，但行動者仍是可能相互信任，乃是因為其交易有制度性的保障，例如契約、證照、評鑑制度。

關於人際信任面向，社會學家陳介玄、高承恕（1991）對於台灣企業的研究，提出「信任格局」的概念，認為所謂信任是指一種「人際信任」，是一種針對特定個人的親近、熟悉所衍生的信任。這與典型西方基於契約所界定的權利義務是不同的。因為這種「人際信任」是由「親」而「信」。換句話說，其信任的建立是特定的、主觀的，而不是基於客觀的標準。心理學家鄭伯壘（1995）提出華人企業主在用人時的三種認知向度，分別是：（1）關係格局：關係的親疏遠近；（2）忠誠格局：忠誠度高，聽話認同，或忠誠度低，不聽話不認同；（3）才能格局：勝任能力強或平庸。進一步將這三種格局延伸出企業組織成員分為八種原型（prototype）：（1）經營核心（親／忠／才）；（2）事業輔佐（親／忠／庸）；（3）恃才傲物（親／逆／才）；（4）不肖子弟（親／逆／庸）；（5）事業伙伴（疏／忠／才）；（6）耳目眼線（疏／忠／庸）；（7）防範對象（疏／逆／才）；（8）邊際人員（疏／逆／庸），不像一般人對家族企業「非親不用」的誤解，家族企業主會因對象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信任與互動法則（陳皎眉、王叢桂、孫蒨如，2014）。

實證研究方面，黃賀、蘇英芳（2005）以銀行業人際信任為自變數，銀行業從業人員工作滿意度為應變數，職位別與社會信任度為調節變數，綜合探討對銀行業從業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影響。結果顯示人際信任度與銀行從業員的工作滿意度乃是以正直歸屬、保守科層與上下互信等因素為基礎；職位與社會信任度變數對銀行業人際信任與銀行從業員的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產生顯著的調節作用。陳嵩等（2011）以上司－部屬間的人際信任為焦點，探討上司家長式領導（包括仁慈、德行及威權領導）、部屬「知覺被上司信任」對部屬工作績效（包括角色內行為

及組織公民行為)的個別及交互作用影響,研究顯示上司仁慈及德行領導行為對部屬「對上司的信任」及「知覺被上司信任」呈顯著正向影響,部屬「知覺被上司信任」對其「對上司的信任」亦呈顯著正向直接影響。敖恒宇、張宇樂、方偉晶(2018)依據2017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所進行的「香港年青人生活狀況調查」,分析顯示個人因素(例如性別、出生地及宗教信仰)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不大,家庭財政狀況及家居條件有著促進作用。此外人際信任及社會制度信任對他們的生活滿意度亦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中研院曾進行針對南韓、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東亞社會資本調查」,是第一次有機會以標準化的測量題目,針對四個東亞社會進行個人日常生活接觸的調查,依照其分類,三種類型的信任命名為:人際信任、制度信任、一般信任,研究發現,四國在「非常信任/信任親戚和朋友」比例都高達九成以上,顯然在最核心的關係上,都具有最高度的信任感,但臺灣和中國的民眾「非常信任/信任鄰居和同事」的比例是較高於日本和南韓,且臺灣和中國具較高度的「社區鄰里關心與支持」,呈現比較高度的鄰居信任(熊瑞梅,2014)。

參、研究設計

一、資料來源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對2017年《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二次基本調查》資料進行量化分析。該研究計畫主持人為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蕭瑞民副教授,並有多位專家學者參與。研究對象以設籍宜蘭縣內年滿20歲之居民為母體,其抽樣設計採分層系統抽樣法,依鄉鎮市人口進行分層,再以系統抽樣法抽出所需樣本數,力求樣本對母群體具代表性。調查以面訪進行,蒐集資料期間為2017年三至五月,總共回收有效樣本數為1,203,各鄉鎮市的實際出抽樣本如表3所示:

表 3

各鄉鎮母體、預期抽取、實際抽取樣本數

鄉鎮市	20 歲以上	抽取	實際抽出	完訪成功 樣本數
	人口數	樣本數		
宜蘭市	75,352	950	941	219
羅東鎮	55,048	700	700	160
蘇澳鎮	33,893	450	448	103
頭城鎮	24,505	300	300	72
礁溪鄉	29,825	500	497	87
壯圍鄉	20,308	250	250	61
員山鄉	26,819	350	250	78
冬山鄉	43,608	550	545	128
五結鄉	33,147	400	400	99
三星鄉	18,212	250	248	55
大同鄉	4,493	150	380	68
南澳鄉	4,346	150	390	73
合 計	369,556	5,000	5,349	1,203

二、變項界定

(一) 自變項

本文之自變項為「社會階級」，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E、階層位置與主觀認同」第 3-1 題：「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是屬於某一個階級，請問您會說您是屬於哪一個社會階級？」分析時將之轉換為連續變項，分為五級：中產階級 5 分、小資本家階級 4 分、勞工階級 3 分、農民階級 2 分、無產階級 1 分。

(二) 中介變項

本文之中介變項為「網絡規模」，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F、社會信任與人際網絡」第 6 題：「當您在生活上碰到一些困難（如工作上、錢財上、法律上要

實際要找人幫忙)時,你想到最可能幫助你的大概有幾個人?」,選項有八個:0人、1-2人、3-4人、5-7人、8-10人、11-15人、16-30人、16-30人,分析時將之轉換為連續變項,計分方式為各選項取組中點,視為社會網絡規模。

(三) 依變項

本文之自變項為「社會階級」,本文之依變項為「心理幸福」,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U、其他」第4題:「整體而言,您覺得您的生活幸福嗎?如果以0分表示很不幸福,10分表示非常幸福,請問您目前的幸福程度有幾分」。直接以受訪者填答分數進行分析。

(四) 調節變項

依據原始問卷,本文之調節變項總共有二項,分別為:

1. 人際信任:

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F、社會信任與人際網絡」第1題:「一般說來,請問您認為大部分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嗎?」分析時將之轉換為連續變項,計分方式為「幾乎都可以信任」5分;「大部分可以信任」4分;「一半可以信任」3分;「大部分不能信任」2分;「幾乎都不能信任」1分。

2. 經濟能力:

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U、其他」第1題:「請問您現在這個工作,您個人平均每個月收入多少元?」依據受訪者填答值進行分析。

三、研究架構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先以中介效果測試社會階級至心理幸福過程中,網絡規模的中介效果;再以調節式中介模型測試人際信任、經濟能力扮演的調節角色。模型設定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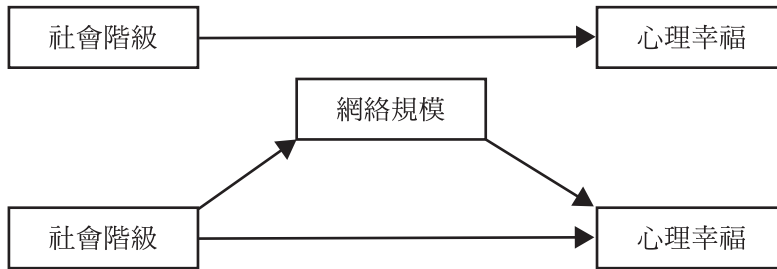
(一) 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採學界廣為依循的 Baron and Kenny (1986)、MacKinnon et al. (2004)

之三階段法，評估是否具完全中介效果（complete mediate effect）：1. 自變項（X）顯著影響中介變項（Me）；2. 自變項（X）顯著影響依變項（Y）；3. 同時將 X、Me 納入迴歸模型，X 對 Y 的預測力會顯著下降。若控制 Me 之後 $X \rightarrow Y$ 預測力仍顯著，稱為部分中介效果（partial mediate effect）；若控制 Me 後 $X \rightarrow Y$ 預測力變得不顯著，則為完全中介效果。本研究假設 1-1、1-2、1-3 將驗證社會階級（X）、網絡規模（Me）、心理幸福（Y）之間的中介效果，如圖 1 所示。為詳盡分析中介、調節式中介模型，本研究援用 Hayes（2018）開發的 PROCESS 套裝軟體，此為以線性迴歸為基礎的路徑分析，用於估計與探索調節式中介模式中交互作用與條件式間接效果的計算工具。圖 4 之中介效果以 PROCESS 套裝軟體中 model 4 之架構進行分析。

圖 4

「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福」之中介效果模型（M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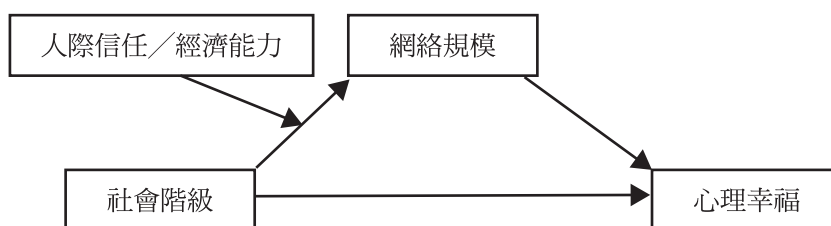
（二）調節式中介效果分析

以「 $X \rightarrow Me \rightarrow Y$ 」的中介模型為基礎，進一步考慮調節變項（Mo）效果。在 X 對 Me、Me 對 Y，以及 X 對 Y 預測過程中納入 Mo，稱為「調節式中介效果」，此乃中介效果和調節效果的組合，指的是 $X \rightarrow Me \rightarrow Y$ 的中介效果會隨著 Mo 的改變而改變（Edwards & Lambert, 2007；Hayes, 2018；Wang & Preacher, 2015）。本研究驗證社會階級（X）至網絡規模（Me）關連中，人際信任／經濟能力（Mo）的調節效果，以及 Mo 在 $X \rightarrow Me \rightarrow Y$ 間的調節式中介效果，如圖 5

所示。PROCESS 套裝軟體中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採 model 7 架構分析，模型設定為兩個迴歸模型：一是以網絡規模為依變項，社會階級、人際信任／經濟能力，以及階級／經濟與信任兩者交互作用項為自變項。

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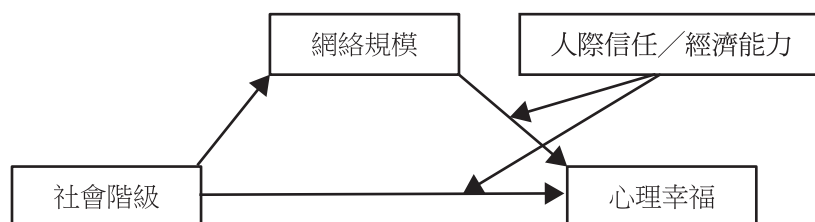
「人際信任／經濟能力」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M7）



本研究進行的另一項測試，是驗證網絡規模（Me）至心理幸福（Y）關連中，以及社會階級（X）至心理幸福（Y）關連中，人際信任／經濟能力（Mo）分別對兩條路徑的調節效果，即為 Mo 在 $X \rightarrow Me \rightarrow Y$ 間的調節式中介效果。如圖 6 所示。

圖 6

「人際信任／經濟能力」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M15）



PROCESS 對此調節式中介效果則採 model 15 架構分析，模型亦設定為兩個迴歸模型：一是以網絡規模為依變項，社會階級為自變項；二是以心理幸福為依變項，社會階級、網絡規模、人際信任／經濟能力，以及階級與信任／經濟、網絡

與信任／經濟兩者交互作用項為自變項。PROCESS 結合兩模型進行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判斷有無調節式中介效果（Hayes, 2018; Preacher et al., 2007）。若調節效果存在，進一步以 Aiken and West（1991）繪製調節效果交叉圖，以釐清調節作用發生的環節。

四、研究假設

依據以上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1-1：社會階級會影響網絡規模。

假設 1-2：社會階級會影響心理幸福。

假設 1-3：網絡規模會中介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M4）。

假設 2-1：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

假設 2-2a：人際信任會調節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假設 2-2b：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假設 3-1a：延續假設 2-1，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7）。

假設 3-1b：延續假設 3-1a、3-1b，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15）。

假設 4-1：經濟能力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

假設 4-2a：經濟能力會調節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假設 4-2b：經濟能力會調節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假設 5-1a：延續假設 2-1，經濟能力對「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7）。

假設 5-1b：延續假設 3-1a、3-1b，經濟能力對「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15）。

肆、資料分析

一、分析變項之描述統計

首先進行本研究變項的次數分配基本描述，總樣本數為 1,116 人。性別約為 1：1，樣本分布十分平均。族群身分以「本省閩南」比例最高，達 82.5%，但原住民也佔了 13.1%。受訪者年齡世代以 50-64 歲最多，佔全體 28.4%；最年輕世代僅 14.7%，比例最低。教育程度則以「高中職」最多，佔全體之 25.8%；但「大學及以上」也佔了 23.6%。居住地區變項將宜蘭 12 個鄉鎮市分為四個等級，「工商市區」（含宜蘭市、羅東鎮）比例最高，達 31%；「偏遠鄉鎮」（含大同鄉、南澳鄉）比例最低，原鄉僅佔 12.3%。

宗教信仰方面以「民間信仰」比例最高，達 32.3%；但無任何宗教信仰者也超過總樣本二成（21.9%）。自變項社會階級結構以「勞工階級」比例最高，幾乎達總數之半（48.7%）；「中產階級」也有 23.7% 的比例。中介變項網路規模以 1~3 人比例最高；為 43.6%；4~6 人次之，為 29%。依變項心理幸福原為 1 至 10 分，表 4 重新分組，1~4 分僅佔全體 6.2%；5~6 分、7~8 分皆非常多，分別佔全體的 38.4%、36.4%。調節變項之人際信任以「一半的人可以信任」比例為總數之半

表 4

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女生	561	50.3	宗教信仰	佛教	171	15.3
	男生	555	49.7		道教	186	16.7
族群身分	台灣閩南人	921	82.5		民間信仰	360	32.3
	台灣客家人	22	2.0		一貫道	11	1.0
	大陸各省市	27	2.4		天主教	49	4.4
	台灣原住民	146	13.1		基督教	95	8.5
					無宗教信仰	244	21.9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年齡世代	20-29 歲	164	14.7	社會階級	無產階級	187	16.8
	30-39 歲	182	16.3		農民階級	76	6.8
	40-49 歲	197	17.7		勞工階級	543	48.7
	50-64 歲	317	28.4		小資本家階級	46	4.1
	65 歲以上	256	22.9		中產階級	264	23.7
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255	22.8	網絡規模	無網絡	90	8.1
	國初中	216	19.4		1~3 人	487	43.6
	高中職	288	25.8		4~6 人	324	29.0
	專科	94	8.4		7~9 人	145	13.0
	大學（含以上）	263	23.6		10 人以上	70	6.3
居住地區	偏遠鄉鎮 （大同南澳）	137	12.3	心理幸福	1~4 分	69	6.2
	低度開發 （頭礁壯員三）	328	29.4		5~6 分	429	38.4
	新興市鎮 （五冬蘇）	305	27.3		7~8 分	406	36.4
	工商市區 （宜羅）	346	31.0		9~10 分	212	19.0
婚姻狀態	未婚	277	24.8	人際信任	幾乎都不能信任	19	1.7
	已婚	691	61.9		大部分不能信任	162	14.5
	同居	3	.3		一半可以信任	549	49.2
	離婚	39	3.5		大部分可以信任	364	32.6
	配偶去世	106	9.5		幾乎都可以信任	22	2.0
健康狀況	非常不好	0	0.0	經濟能力	無收入	477	42.7
	不好	123	11.0		0~2 萬	84	7.5
	況普通	288	25.8		2~3 萬	200	17.9
	良好	535	47.9		3~4 萬	165	14.8
	非常好	170	15.2		4 萬以上	190	17.0
總計		1,116	100.0				

（49.2%）；「大部分的人可以信任」的比例也不低，佔全體 32.6%。最後一個調節變項「經濟能力」以無收入比例最高，達 42.7%；其餘各項比例約在一成左右。

二、中介效果評估：網絡規模在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間的中介關係

本研究首先分析網絡規模在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間的中介效果，此部分採 Baron and Kenny（1986）程序：1. 自變項對中介變項具有顯著的影響力；2. 自變項對依變項有顯著的影響力；3. 同時將自變項、中介變項納入迴歸模型，自變項的影響力會下降。如圖 7 所示，社會階級對於網絡規模有顯著的直接影響（ $b = .3291$ 、 $p < .001$ ），第一個條件及假設 1-1 成立，社會階級對於心理幸福也有顯著的直接影響（ $b = .2650$ 、 $p < .001$ ），第二個條件及假設 1-2 成立。同時納入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網絡規模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力也顯著（ $b = .0906$ 、 $p < .001$ ）、而社會階級的影響力略下降（ $b = .2352$ 、 $p < .001$ ），第三個條件及假設 1-3 也成立。由於自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力仍顯著，因此稱為部分中介效果（Baron and Kenny, 1986；Hayes, 2018）。如同假設 1-3「網絡規模中介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所言，社會階級可以透過網絡規模的中介歷程來預測心理幸福，社會階級地位愈高者網絡規模愈豐富，網絡規模愈大者，心理幸福感愈高。

進一步以表 5 詳細檢視中介關係，社會階級對於心理幸福的總效果為 .2650、

圖 7

網絡規模在「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中介模型（M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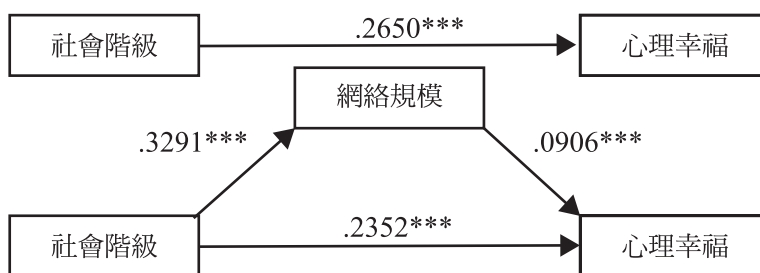


表 5

中介效果模型之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比較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總效果	.2650	.0433	6.1228	***	.1801	.3499
直接效果	.2352	.0429	5.4783	***	.1509	.3194
	Effect	Boot SE	Z	p	Boot LLCI	Boot ULCI
間接效果	.0298	.0086	3.4651	**	.0142	.0484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

直接效果為 .2352，間接效果則為兩者差額的 .0298，標準誤為 .0086，計算出 Z 值為 3.4651 ($p < .05$)，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 檢定法則，間接效果顯著。

三、人際信任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效果分析

除了中介關係之外，本研究的另一個研究焦點在於「調節效果」的測試，因此接下來探討社會階級透過網絡規模影響到心理幸福過程中，人際信任扮演何種角色？首先在「階級地位—社會網絡—幸福感」路徑中加入交互作用變項，以測試「人際信任」變項的調節效果，如圖 8 所示，社會階級與人際信任之交叉相乘項對於網絡規模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b = .2928$ 、 $p < .01$)，假設 2-1「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獲得支持，社會階級對於網絡規模的影響會因為人際信任的高低，產生不同程度的作用。

圖 8

人際信任在「階級地位—社會網絡—幸福感」之調節式中介模型 (M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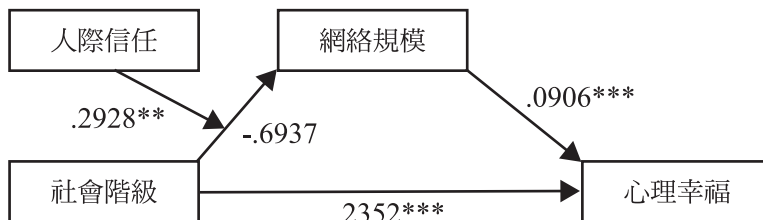


表 6 為調節式中介模型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驗證「社會階級—網絡規模」之間，三個高低不同程度的「人際信任」之調節效果是否有顯著作用。分析顯示，在中度人際信任（95% Boot LLCI/ULCI=[.0075, .0371]）、高度人際信任（95% Boot LLCI/ULCI = [.0171, .0729]）時中介效果達到顯著，低度人際信任（95% Boot LLCI/ULCI = [-.0264, .0262]）時不顯著。

表 6

調節式中介模型之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分析

	人際信任	Boot 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社會階級	低 (2.4221)	.0014	.0133	-.0264	.0262
↓	中 (3.1864)	.0217	.0077	.0075	.0371
網絡規模	高 (3.9506)	.0419	.0142	.0171	.0729

接著分析調節式中介效果，檢視調節式中介模型間接效果與條件式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Hayes, 2018），表 7 顯示調節式中介效果檢驗指標之信賴區間不包含 0（Index = .0265、Boot SE = .0149、95% Boot LLCI/ULCI = [.0011, .0589]），假設 3-1a「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7）」，該假設獲得證實。

表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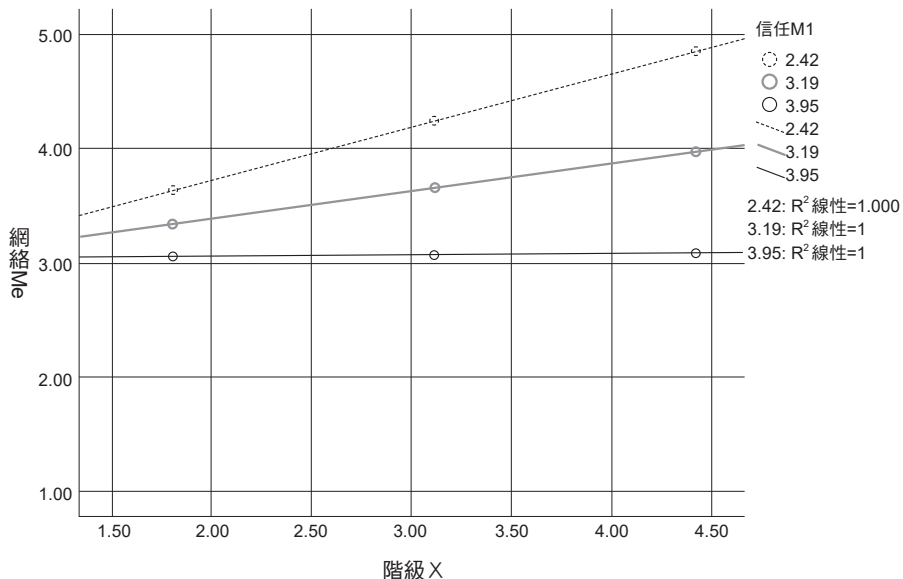
調節式中介效果（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分析

	Index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人際信任	.0265	.0149	.0011	.0589

假設 2-1 證實「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即表示：「社會階級對於網絡規模的作用，會因為人際信任的高低，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其中的關係究竟如何？為了更清楚說明其關連，即參考 Aiken and West

(1991)，將預測變項與調節變項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代入迴歸模型進行繪圖，如圖 7 所示。表 6 所謂「條件式」，就是將人際信任分為高／中／低三組以探求社會階級和網絡規模間的關聯，圖中呈現代表高信任組的綠線呈現從左中到右上走勢，即「社會階級和網絡規模的正向關聯性」，意思就是：「認同社會上能夠信任的人偏多」這個群體，他們的階級地位愈高時，社會網絡的規模也愈大；反之，社會階級地位低者，網絡成員則偏少。至於「認同社會上能夠信任的人偏中」這個群體，雖然他們的社會階級和網絡規模的關係仍為正，但關聯性不如高信任群體（圖 9 綠線的斜率不及紅線，且表 6 的效果值也較小： $.0217 < .0419$ ）。至於最後一個「認同社會上能夠信任的人偏少」群體，圖 7 中表該群體的藍線呈現水平走勢，表 6 的效果值極小，檢定結果不顯著（Boot LLCI 及 ULCI 包含 0），所以不討論此一群體的調節效果。

圖 9
人際信任在「階級地位—社會網絡」之調節型態



經過了 Hayes (2018) PROCESS model 7 的測試後，接下來測試 model 15，亦即「中介變項—依變項」、「自變項—依變項」部分調節效果，以圖 8 觀之，即為人際信任在「網絡規模—心理幸福」、「社會階級—心理幸福」路徑中的調節效果。圖 10 分析顯示：網絡規模與人際信任的交乘項不顯著 ($B = -.0223$ 、 $p > .05$)，社會階級和人際信任的交乘項也不顯著 ($B = -.1071$ 、 $p > .05$)，並未支持假設 2-2a「人際信任會調節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的關係」、假設 2-2b「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的關係」，兩個假設均未獲得證實。

圖 10

人際信任在「階級地位—社會網絡—幸福感」之調節式中介模型 (M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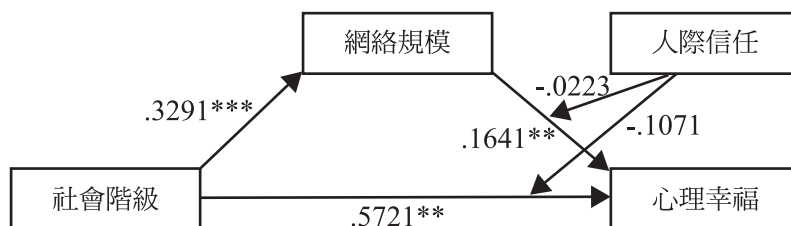


表 8 為調節式中介模型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驗證「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間，三個高低不同程度的「人際信任」之調節效果是否有顯著作用。分析顯示，無論是低度人際信任 (95% Boot LLCI/ULCI = [.0159, .0637])、中度人際信任 (95% Boot LLCI/ULCI = [.0143, .0519])、高度人際信任 (95% Boot LLCI/ULCI =

表 8

調節式中介模型之條件式間接效果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 分析

	人際信任	Boot 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網絡規模	低 (2.4221)	.0362	.0122	.0159	.0637
↓	中 (3.1864)	.0306	.0095	.0143	.0519
心理幸福	高 (3.9506)	.0249	.0082	.0103	.0428

[.0103, .0428]) 時中介效果皆達到顯著。

另在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檢驗方面，表 9 顯示調節式中介效果檢驗指標之信賴區間有包含 0 (Index = -.0074、Boot SE = .0057、95% Boot LLCI/ULCI = [-.0200, .0024])，假設 3-1b「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 (M15)」，此一假設並未獲得支持。也就是說，無論是處於高／中／低等級的人際信任，網絡規模的大小，都不會影響到心理幸福與滿足。由於不具備調節式中介效果，故不繪製 Aiken and West 交互作用圖。

表 9

調節式中介效果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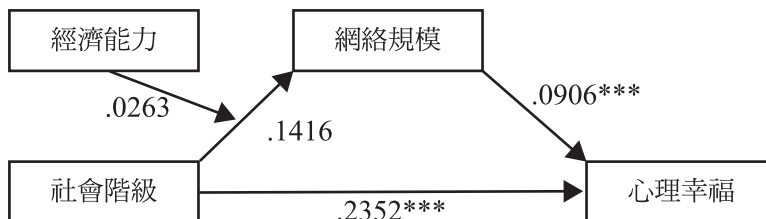
	Index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人際信任	-.0074	.0057	-.0200	.0024

四、經濟能力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效果分析

除人際信任外，本研究另一個議題要討論「經濟能力」的調節作用，一樣援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的基本模型，分析此過程中第二個調節變項「經濟能力」是否也發揮同等的調節效果？分析結果如圖 11，對網絡規模而言，經濟能力與社會階級的交乘項不顯著 ($b=.0263$ 、 $p>.05$)，但網絡規模對心理幸福 ($b=.0906$ 、 $p<.001$)、社會階級對心理幸福 ($b=.2352$ 、 $p<.001$) 影響力都非

圖 11

經濟能力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模型 (M7)



常顯著。於是假設 4-1：「經濟能力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並未獲得支持。

表 10 為調節式中介模型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驗證「社會網絡—網絡規模」之間，三個高低不同程度的「經濟能力」之調節效果是否有顯著作用。分析顯示，無論是低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038, .0285]）、中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008, .0385]）、高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097, .0661]），間接效果皆未達顯著。至於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檢驗，表 11 之效果檢驗指標信賴區間有包含 0（Index = .0024、Boot SE = .0042、95% Boot LLCI/ULCI = [-.0051, .0120]），假設 5-1a「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 (M7)」，此一假設並未獲得支持。

表 10

調節式中介模型之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分析

	經濟能力	Boot 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社會階級	低 (0.0000)	.0128	.0082	-.0038	.0285
↓	中 (2.1125)	.0179	.0100	-.0008	.0385
網絡規模	高 (4.7358)	.0241	.0190	-.0097	.0661

表 11

調節式中介效果（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分析

	Index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經濟能力	.0024	.0042	-.0051	.0120

最後驗證「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過程中，經濟能力在網絡規模和心理幸福的調節效果。圖 12 顯示經濟能力和網絡規模的交乘項達顯著（ $b = -.0155$ 、 $p < .01$ ），假設 4-2a「經濟能力會調節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的關係」獲得支

持；但經濟能力和社會階級的交乘項未達顯著（ $b=.0007$ 、 $p>.05$ ），則不支持假設 4-2b「經濟能力會調節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圖 12

經濟能力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模型（M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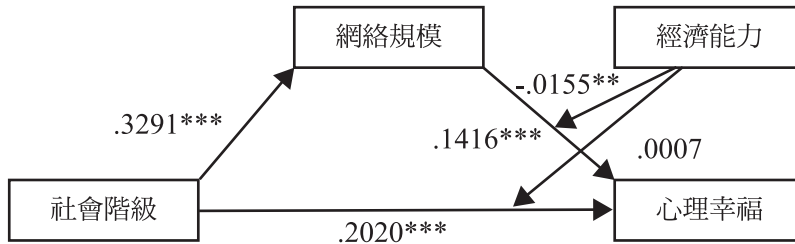


表 12 為調節式中介模型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驗證「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間，三個高低不同程度的「經濟能力」之調節效果是否有顯著作用。分析顯示，無論是低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212, .0801]）、中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161, .0603]）、高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084, .0391]），間接效果皆達顯著。至於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檢驗，表 13 之效果檢驗指標信賴區間未包含 0（95% Boot LLCI/ULCI = [-.0104, -.0019]），假設 5-1b「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15）」獲得支持。

表 12

調節式中介模型之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分析

	經濟能力	Boot 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網絡規模	低 (0.0000)	.0466	.0149	.0212	.0801
↓	中 (2.1125)	.0359	.0112	.0161	.0603
心理幸福	高 (4.7358)	.0225	.0079	.0084	.0391

表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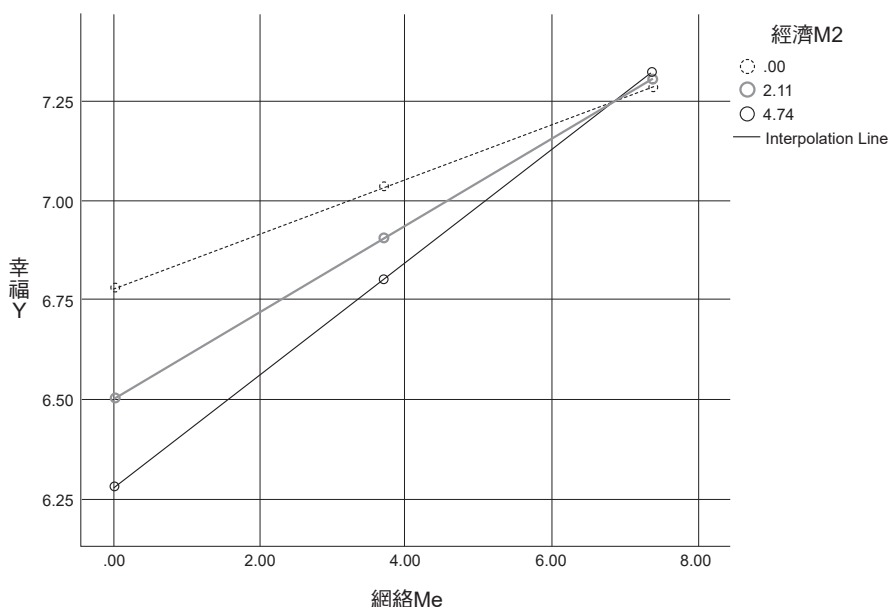
調節式中介效果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分析

	Index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經濟能力	-.0051	.0022	-.0104	-.0019

由於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因此以 Aiken and West (1991) 繪製「經濟能力對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之交互作用」，從圖 13 觀之，無論是高收入的虛線、中收入的長虛線、低收入的實線，都呈現出網絡規模和心理幸福之間的正向關係，其中又以實線的斜率最大、虛線最小，意思就是「經濟地位較低」這個群體，他們的網絡規模愈大，體會到的幸福感愈高；而「經濟能力較高」的群組，網絡和幸福之間的關係仍是存在，但關聯性相對較弱。

圖 13

經濟能力在「社會網絡—心理幸福」之調節型態





伍、結論

一、研究結論

現今台灣社會普遍生活無虞，物資缺乏的日子離我們很遠，但心理幸福卻是重要議題，它甚至超越了物質條件，成為人們評量未來是否具希望的關鍵。官方和民間的調查皆顯示宜蘭縣是個令人幸福的地域，但是針對宜蘭人「何以覺得幸福」？始終缺乏學理上的探討。本研究以 2017 年《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二次基本調查》大樣本抽樣調查研究所蒐集的樣本進行分析，補足了過去研究的缺口，獲得幾個重要的結論如下：

（一）宜蘭民眾之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和心理幸福之間存在中介關係

根據理論文獻的指引，本研究以「社會階級」為自變項，「網絡規模」為中介，共同解釋宜蘭縣居民的「心理幸福」，並且測試此關係如何因為「人際信任」、「經濟能力」不同而有差異，以「調節式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做為檢證模型。首先為中介模型，驗證「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的路徑過程中，「網絡規模」的中介效果（Baron and Kenny, 1986；MacKinnon et al., 2004）。此「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路徑過程中，原本階級對於幸福感的總效果，在模型納入了網絡之後，不但網絡對幸福感的影響力顯著之外，階級對於幸福感的影響力依然明顯，即為所謂「部分中介效果」，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都存在。

白話地講，社會階級會透過網絡規模，傳達其對於心理幸福的作用。研究發現，社會階級的確會透過網絡規模，影響到心理幸福，其間有正向關係，比起低階級者，宜蘭高社會階級居民網絡規模更大，也影響到主觀幸福感愈高。由此可見，高階級地位者人脈愈廣，對於身心的幸福有顯著的影響。這樣的關聯正足以凸顯宜蘭社會真實的面貌。社會地位愈高者，愈有機會結交很多不同朋友，充實社會網絡，人際網絡中的份子有些能夠達成情感性的功能，例如分享心事、情緒支持；另

有些則是具有工具性的功能，例如法律諮詢、借貸、處理事務，無論是情感性網絡或是工具性網絡，網絡規模愈大者，能夠聯繫到各式各樣的朋友的機會愈大、解決困難，使得心理幸福感提升。

（二）人際信任正項調節社會階級和網絡規模間之關係

除了中介之外，本研究另一個分析重點在於「調節」效果。所謂調節（moderation），學理上是指其對自變項 X 與依變項 Y 之間斜率的影響程度，也就是在調節項不同高低程度下，原本 X 與 Y 關係的變化。本研究以「人際信任」為調節變項，意思就是指在高／中／低程度的人際信任狀況下，原本「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的中介關連有沒有變化；也就是說三者的中介關係是否因為高低人際信任，而有不同的影響模式？本論文採用 Edwards and Lambert（2007）建議的模型將宜蘭民眾分為高、中、低「人際信任」三群，高人際信任這群人，「社會階級—網絡規模」間關係呈現很高的正相關，地位高者網絡規模大、地位低者網絡規模小；反之，低人際信任群體「社會階級—網絡規模」間關係不顯著，無論自己社會地位高低，並不影響他的人脈多寡。由此可見，若是信任他人程度愈高，自己的階級位置可直接轉化為拓展社會網絡的資源，而建立更充實的人脈，進一步提升心理幸福感。可見人際信任的強度，扮演著促進幸福感的關鍵角色。

（三）經濟能力正項調節網絡規模和心理幸福間之關係

若說「人際信任」是軟實力、象徵「經濟能力」的每月收入則是硬實力，本研究的第二個調節變項，就是考驗個人硬實力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力。前一個針對軟實力的測試，發現調節效果發生在中介效果的前半段，也就是「社會階級—網絡規模」階段，後半段則沒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反觀硬實力「經濟能力」的調節效果，則是恰恰相反，只發生在「網絡規模—心理幸福」階段，前半段則不顯著，可見軟／硬實力在幸福感因果關聯中，各自在不同階段展現顯著的影響力。

再者，本研究依舊將月收入分為高、中、低三組，每一組的「網絡規模—心理

幸福」都呈現了正向關聯都存在，也就是說，無論收入多寡，民眾的社會網絡人脈規模愈大，能夠提升心理幸福感程度愈高，此正向聯結乃是十分穩定。但不同的是，「低經濟實力」群體社會網絡—幸福感正向關聯最強；「經濟實力居中」群體次之；「高經濟實力」群體最弱，網路能夠提升幸福感的程度最低，也就是說，經濟能力高低與「網絡與幸福關聯性」成反比。收入較低的人，如果朋友和幫手多，會大大提高心理的滿足與幸福感；但是以收入高的人而言，固然朋友多人脈廣也會造就幸福感，但程度明顯較低，可見其幸福感來源不只是網絡豐厚程度。可見經濟能力低者比較樂天知命，或許很多朋友、幫個小忙就可讓他感到很幸福，但這個邏輯顯然不適用於高經濟能力的人。

二、實務建議

經由以上的分析，本論文提出四點實務建議：

（一）協助青年在地創業活絡經濟，提升青年世代心理幸福

為了幫助青年實踐自我，宜蘭縣政府在 2020 年一月一日成立青年事務科，提供最高 150 萬元的「宜蘭青年專屬低利創業貸款」，幫助青年取得第一桶金，透過二年貸款利息全額貼補、降低創業初期資金壓力，搭配專案管理、專人服務及專家諮詢等「三專式」創業輔導，助其站穩創業第一步。此外，縣府也搭配「宜！蘭人市集」品牌策略，為新創業者爭取多方曝光機會。該市集結合在地數十家青創品牌，包含釀酒、異國餐飲、文創觀光、遊戲等多元樣態，引入表演藝術活動，搭配 DJ、舞者、演唱者等，打造具有宜蘭特色及「在地國際化」的市集形象，提升青創品牌的知名度、跨界交流合作及深耕拓銷。縣府積極組建「創業大聯盟」，攜手宜科青年及在地大學，打造資源共享平台，提供整合行銷、募資、創業知識、產學合作、研發、業師等服務。目前，已協助多加新創品牌，成功通過今年地方產業創新研發補助（SBIR）計畫（蘭陽農業發展基金會，2020）。宜花東長期以來被認為就業機會比不上西部，是好山好水但經濟活動不熱絡的「後山」，這種錯誤的刻板印象往往影響青年不願在地落地生根，年輕人力外流也使得人口結構老化速度

趨於快速。如上所述由公部門帶領擴增青年就業機會，伴隨著企業進駐帶動經濟發展、青創頭家激發熱情活力，使得年輕人覺得留在宜蘭有錢賺、有希望，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由青年頭家當火車頭，自然能夠帶動且活絡產業經濟，年輕人是社會的希望，青年世代的幸福就是整個社會的幸福。

（二）拓展老年世代網絡規模，增強人際互動之幸福感受

以上是年輕世代的建議，除此之外，在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宜蘭，老年世代更需關心。宜蘭民眾的社會網絡規模、人脈充足性確實可以有效提升主觀幸福感，是本研究的重要發現，原因在於情感性與工具性功能獲得滿足，另一方面，網絡的豐富直接關聯到平日社會互動的多樣性與繁複性，人是群居的動物，與人互動的確可以造就心理愉悅，其中又以老人最需關心。本研究發現 65 歲以上老人不但階級地位最低、收入最低、社會網絡規模最小、人際信任感最低，就連幸福感也是最低，明顯低於其他各年齡層。職是之故，建議宜蘭的公、私部門相關單位，可以健全正式、非正式的交友平台，增加老人互動機會，如結合各地社區關懷據點、社區發展協會、樂齡學習中心、長青俱樂部、長照 2.0 各類社區服務據點、老人會等社區組織，發展結合服務、健康、休閒、樂活、心靈五合一之服務模式。以提供居民拓展社會網絡的機會，多交朋友多從事公開、健康的社交活動，藉此提高心理幸福感受。衛福部訂定的「社區防疫人力工作指引」指出，將成立因應 Covid-19 關懷中心，由護理志工進駐，主動關懷因疫情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民眾，提供相關心理支持與關懷，協助社區防疫及關懷老人事項。過去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成立且普及之時，針對老人（特別是獨居）關懷訪視、送餐、健康促進、電話問安，雖然不用花費巨大成本，但是可提供老人溫馨且幸福的感受。

（三）以志願服務提升社會人際信任，老齡志工尤其珍貴

人際信任除了對於拓展網絡規模、提升幸福感有顯著效果外，在社會階級影響人際網絡的過程當中，也存在明顯的調節效果，可見「對他人信任與否」在今日宜蘭社會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然而，如何提高對他人的信任感？特別是現今網路

化、虛擬化的社會，由於詐騙橫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疏離，要重回過去前工業時代的人際信任關係十分不易。本研究認為擔任「志工」是相當具體且有效的入手點，自發性地從事志願服務，從服務他人的過程當中不但能夠獲得自身精神意義上的滿足，也能夠提升對他人的信任度。以志願服務觀之，2020 年我國領冊志工有 99 萬 4,553 人，總服務時數 8,619 萬 7,694 小時，總產值達 136 億 1,923 萬元，志工人力投入在衛生福利領域（41.2%）比例最高，這些龐大的人力提供台灣社會非常巨大的力量。主管機關衛福部宣稱以社區互助、互信為基礎，串連社區居民和資源，進而重建強化社區及社會之互助網絡。目前全國 65 歲以上志工人數 28 萬 1,013 人，佔志工總數 28.3%，佔全國 65 歲以上總人口數之 7.42%，亦為相當龐大的人力，政府應促進高齡志工參與，擴充長者志願服務機會，透過社區、村里、機關、團體深化高齡志工宣導，這是助人，也是自助。

（四）堅持環保與觀光路線藉以揚昇民眾心理幸福與光榮感

心理幸福是一個主觀的測量，個人覺得自己「幸不幸福」？其實影響因素非常多，大至外在的環境，小至個人內心皆然，台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和諧而且美好的家園，人民心裡大多是安定的，在這種狀況下，要提升人民的心理幸福感並不困難，政府當局若能提供人民生活環境的穩定，應該就能夠達到目的。台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日前公布各縣市施政滿意度調查，在非六都 16 縣市的競爭排名中，宜蘭縣排列第三，與去年排名第 11 相比之下進步神速。在十大施政調查項目，宜蘭以「環境保護」與「觀光旅遊」拿下第一名金獎，兩大施政項目滿意度在 16 縣市中奪下全國第一，也肯定了宜蘭縣長期以「環保立縣」的政策走向，宜蘭民眾幸福感程度除金門、澎湖外，台灣本島宜蘭縣民的幸福指數最高（邱明瑜，2021）。天下文化採用經濟力、環境力、施政力、文教力、社福力等五個項目；經濟日報則是以居住、收入、就業、社群關係、教育、環境品質、健康、政府治理、安全、生活滿意度等指標計算民眾的幸福感，以宜蘭縣而言，政府能夠保障民眾在環境保護與觀光旅遊上的高品質，是積極正確的方向；此外，宜蘭縣是一個高齡老年化的鄉

鎮，政府應確保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能夠維持活力與尊嚴，並有足夠的休閒設施與活動安排，以及照顧者的喘息空間，使其能夠蓄積能量再出發，積極推動「在地老化」與「福利社區化」。宜蘭有好山好水優越的天然條件，地方政府能夠提供民眾身心安定與環境安全，加以人際網絡的綿密豐足，自然就能夠讓民眾滿足，提高宜蘭居民心理的妥適舒服感。

參考文獻

- 天下雜誌（2019）。2019 幸福城市縣市調查。天下雜誌，681 期。
- 天下雜誌（2020）。宜蘭，全方位的幸福城市。線上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2792>
- 吳齊殷、李文傑（2003）。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偏差行為併發之關係機制。台灣社會學，6，11-175。
- 李忠一（2021 年 5 月 6 日）。施政有感 宜蘭縣全台最幸福城市。中國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506000487-260107?chdtv>
- 林大森（2016）。檢視多元依附關係——宜蘭縣高中生家庭、學校、社區依附對憂鬱傾向之影響：結構方程模式之驗證。收錄於陳志賢主編，宜蘭學 2015，頁 120-146。臺北：風雲論壇。
- 林大森（2023）。階級。收錄於陳淑敏、許殷宏主編，教育社會學：理論、經驗與應用（頁 119-139）。台北：高等教育。
- 林大森、蕭瑞民（2017）。宜蘭民眾社會網絡特質對幸福感之影響。收錄於陳志賢主編，宜蘭學 2016（頁 29-63）。臺北：風雲論壇。
- 林宗弘（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43，93-158。
- 林俊瑩、黃毅志（2006）。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因果關聯的方向性之探討：臺東師院追蹤調查資料的貫時性分析。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6(1)，1-39。
- 林南、陳志柔、傅仰止（2010）。社會關係的類型和效應：臺灣、美國、中國大陸

- 的三地比較。臺灣社會學刊，45，117-162。
- 邱明瑜（2021）。宜蘭幸福感指數居本島之冠，觀光及環保拿下 16 縣市第一名。
線上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s://www.hiilan.com.tw/2021/05/32183/>
- 邱惠娟、童心怡（2010）。教師幸福感內涵之探究。學校行政雙月刊，67，168-180。
- 施建彬（1995）。幸福感來源與相關因素之探討〔未出版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高雄市。
- 張芳全（2017）。家庭社經地位對英語學習成就之影響－以幸福感為中介。學校行政，108，204-221。
- 張芳全、夏麗鳳（2011）。新移民子女的人際關係與幸福感之研究。彰化師大教育學報，20，73-101。
- 敖恒宇、張宇樂、方偉品（2018）。香港社會科學學報，51，1-27。
- 陳介玄、高承恕（1991）。台灣企業運作的社會秩序：人情關係與法律。東海學報，32，219-232。
- 陳偉瑀（2016）。不同類型運動觀光客在參與動機、遊憩體驗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旅遊健康學刊，15(1)，41-54。
- 陳皎眉、王叢桂、孫蓓如（2014）。社會心理學（3 版）。台北：雙葉。
- 陳嵩、陳光偉、李佩芬（2011）。垂直人際信任對部屬工作績效之影響：上司家長式領導的角色。管理學報，28(1)，1-29。
- 陸洛（1998）。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1)，115-137。
- 傅仰止（2002）。個人網絡中他人聯繫強度的結構原理。臺灣社會學，3，163-209。
- 傅仰止（2014）。性別化的社會資本與配偶網絡。社會科學論叢，8(2)，125-165。
- 黃賀、蘇英芳（2005）。我國銀行業人際信任度之研究。人力資源管理學報，5

(3)，1-20。

黃銘福、黃毅志（2010）。影響台東縣國二學生心理幸福之因果機制：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網絡何者重要。*教育與社會研究*，21，1-37。

經濟日報（2018）。2018 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報告。2019 年 9 月 23 日。取自於 <http://edn.udn.com/ACT/2018/happy/chart/2018.pdf>

葉明勳、陳碩菲（2019）。宜蘭地區老人主觀幸福感與自覺健康之調查研究：兼論長照 2.0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影響。*發展與前瞻學報*，25，81-101。

熊瑞梅（1999）。核心網絡的性別特質。發表於，*臺灣社會的個人網絡：第三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熊瑞梅（2001）。性別、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收錄於邊燕杰、涂肇慶、蘇耀昌編，*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方法與發現*（頁 179-21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鄭伯壘（1995）。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本土心理學研究*，3，142-219。

謝亞恆、謝易庭（2009）。社會網絡、重視身材與心理幸福因果模型之建構與檢證：以臺灣地區大學生為例。*教育與社會研究*，19，83-110。

謝雨生、吳齊殷、李文傑（2006）。青少年網絡特性、互動結構和友誼動態。*台灣社會學*，11，175-234。

蘇秀慧（2019 年 1 月 17 日）。宜蘭縣幸福指數一路攀升，社群關係全台第一。*經濟日報*。<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9003/3597831>

蘭陽農業發展基金會（2020）。宜蘭——全方位的幸福城市。*天下雜誌*。線上檢索日期：2020 年 11 月 17 日。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2792>

Aiken, L. S., & West, S. G.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Ainsworth, M. D. S. (1989). Attachment beyond infa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4), 709-716.

Andersen, M. L. and Taylor, H. F. (2016). *Sociology: The Essentials*(9th). UK: Cengage

Learning.

- Hetzer, N. D. (1965). Environment, tourism, culture. *Links (July): Reprint in Ecosphere*, 1(2), 1-3.
- Holbrook, M. B. (1996). Customer Valu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3, 138-142.
- Andrews, F. M., & Withey, S. B. (1976).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s perception of life quality*. New York:Plenum Press.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 Buehler, C., Benson, M. J., & Gerard, J. M. (2006). Interparental hostility and early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specific aspects of parenting.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6(2), 265-292.
- Burt, R.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345-423.
-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 Colquitt, J. A., Scott, B. A. & LePine, J. A. (2007). Trust, trustworthiness, and trust propensity: A meta analytic test of their unique relationships with risk taking and job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4), 902-927.
- Davies, P. T., and Cummings, E. M. (1994).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3), 387-411.
- Diener, E., Suh, E.M., Lucas, R.E., & Smith, H. 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 276-302.
- Dirks, K. T. & Ferrin, D. L. (2002). Trust in leadership: Meta-analytic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7(4), 611-

628.

-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Pp. 89-125, in Paul A. D. and Melvin W. 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asterlin, R. A.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7, 35-47.
- Edwards, J. R., & Lambert, L. S.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2(1), 1-22.
- Emirbayer, M., & Goodwin, J.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6), 1411-1454.
- Erikson, R. & Goldthorpe, J. H. (1992). *The constant flux*.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raham, C. & Pettinato, S. (2000). Happiness, markets,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 237-68.
- Hartup, W. W. (1996). The company they keep: Friendship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significance. *Child Development*, 67, 1-13.
- Hayes, A. F. (2018).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 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 Helliwell, J. F., Layard, R., Sachs, J. D., De Neve, J.-E., Aknin, L. B. and Wang, S. (2023).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ed/2023/>
- Hsung, R-M, Lin, N. & Brieger, R. (2009).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London: Routledge.
- Ikeda, K. (2013).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in East and Southeast.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9(1), 13-45.

- Kadushin, C. (2012). *Understanding social networks: Theories, concepts and finding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ssin, S., Fein, S. & Markus, H. R. (2016). *Social psychology(10 th)*. MA: Cengage Learning.
- Lin, C.-C. (2015). Chinese revi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測驗學刊*, 62(4), 261-277.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N., Fu, Y-C. & Chen, C-J. (2014). Social capital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3-18 in Lin, N., Fu, Y-C. and Chen, C-J (eds.), *Social capital and its institutional contingency: A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MacKinnon, D. P., Lockwood, C. M., & Williams, J. (2004). Confidence limits for the indirect effect: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 and resampling method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9, 99-128.
- Marsden, P.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1), 122-131.
- McLeod, J. D. & Owens, T. J. (2004).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he early life course: Variations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gender, and race/ethnicit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7(3), 257-278.
- Naisbitt, J. (1984).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New York: Warner Communication.
- Perry, B. D. (2001). Raising a nonviolent child: The power of attachment. *Scholastic Parent and Child*, 9(2), 32.
- Phelps, C. C. (2010).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alliance network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n firm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53 (August), 890-913.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osenberg, M., Schooler, C., Schoenbach, C., & Rosenberg, F. (1995).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Different concepts, differen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719-745.
- Ryff, C. D., & Keyes, C. L. M. (1995).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4), 719-727.
- Santrock, J. W. (1998). *Adolescence (7 ed)*. US: McGraw-Hill.
- Schyns, P. G. (1998). Diagnostic recognition: Task constraints, object Inform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s. *Cognition*, 67, 147-179.
- Tang, F., J. Mu, & D. L. MacLachlan. (2008). Implication of network size and structure on organizations' knowledge transfer.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34 (February), 1109-1114.
- Umberson, D., Chen, M. D., House, J. S., Hopkins, K. & Slaten, E. (1996). The effe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re men and women really so differ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837-857.
- Walker, K. N., Macbride, A. & Vachon, M. L. S. (1977).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crisis of bereavemen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1(1), 35-41.
- Wanberg, C. R., Csillag, B., Douglass, R. P., Zhou, L., & Pollard, M. S. (2020).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ell-being during COVID-19: A resource-based examin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12), 1382-1396.
- Wang, L., & Preacher, K. J. (2015).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using Bayesian metho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2, 249-263.
- Weber, M. (1982). Selections from economy and society, vols.1 and 2. In A. Giddens & D. Held (Eds.),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 (pp. 60-8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llman, B. (1988).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y. Pp. 19-61 in Wellman B. and Berkowitz, S. D.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MA: Cambridge Press.
- Yen, T-J, Fu, Y-C, Hwang, J-S. (2016). Alters as species: Predicting personal network size from contact diaries. *Social Networks*, 45, 78-88.
- Zucker, Lynne G. (1986).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8, 53-111.